



□肖复兴

【人生随想】
采桑子

儿时住的大院后院的一排北屋后，有一条夹道。在老北京的四合院里，有这样夹道的并不多见，都是有讲究的。这是因为四合院一般都是坐南朝北，这条夹道可以阻挡冬天北风的袭来。我们院这条窄长的夹道里，种着两棵桑树，这就不仅没什么讲究，而且有些二八月乱穿衣了，因为一般认为桑树和松树都是坟地里的树，在四合院里种这样的树不吉利。不知道我们大院最初的主人为何选择了桑树。

我小时候，这两棵桑树长得已经很粗壮了，高出后墙一截子。如果从外面看，枝叶葱茏，完全看不见大院里面的样子。每年到谷雨前后，桑树结果，这两棵桑树，一棵结白桑葚，一棵结紫桑葚，猜想是当年房主特意的选择。每年这时候，大院里的孩子常爬到桑树上采桑葚吃。其实，这玩意儿说甜不甜，说酸不酸，不怎么好吃，而且，桑葚很软，皮又薄，特别是紫桑葚的汁浆乎乎的，常常会弄得一手一脸全是，甚至会沾染在衣裳上，回家必定挨骂。

但是，我还是爱去后院夹道去采桑葚。吃是次要的，主要是采桑葚过程的乐趣很大，很有吸引力。到夹道去，必须翻过后院北房，但总不能蹬着人家的窗户直接上房吧？必得从房屋旁边的山墙上去，山墙紧连着大院的厕所，厕所比北房矮，为我们提供了上房的方便。我们一帮小孩子便从厕所的木门上爬过去，先爬上厕所的房顶，再顺着山墙爬上北房的房顶，然后翻进夹道。这需要点儿功夫，虽然不必有燕子李三那样飞檐走壁的能耐，爬门的时候，得用点儿巧劲，才能一下子蹿上去。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，厕所的门并不矮呢。从高高的房顶跳到桑树上，更得需要点儿功夫，而且需要点儿胆量。因为要够着桑树靠近房顶的枝桠，紧紧抱着它，借着它回弹的悠劲儿，像荡秋千似的，一下子悠到树上，有点惊险刺激的劲头儿。

那时候，北房的主人姓蒋，一位和蔼的老爷子。任凭我们这些孩子到他屋后夹道的两棵桑树上折腾，从不呵斥我们。采桑葚的日子里，会弄得我们身上脸上手上都是紫色，也会弄得院子里一地斑斑点点，紫乎乎的，家长骂我们说像是拉了一地鸡屎似的。

采桑葚的时候，常会碰见月玲。她和我一般大，小学同年级，但个子长得比我高，胆子比男孩

子大，是大院有名的疯丫頭。她经常在桑树一边吃桑葚一边嘲笑我，不断地朝我挑衅：敢不敢往树尖上爬？说着，她像只小狸猫似的，噌噌地爬上去，摇晃着树尖的枝子，接着朝我挑衅。从树上下来的时候，我会往她的身上冷不防地抹一把紫桑葚，弄紫她的衣服，然后呼呼地跑走。

少年不知愁滋味，吃凉不管酸。在上房、爬树、采桑葚的过程中，多有几份欢乐。童年短暂一瞬，像一阵风远去，小学、中学，一晃而过。我们的父母先后去世，大院的孩子渐渐变老，也都陆续搬出大院，风流云散。2004年，我写《蓝调城南》时，重访老院，老院正面临拆迁，一片狼藉，破旧不堪。空荡荡的大院里，所剩无几的老街坊中，月玲一家竟然还在。结婚之后，她一直住在她父母的老屋。我走进那两间熟悉的老屋，月玲不在家，她老公在。我没有见过她老公，那是头一次见，他对我显得非常热情亲切，连说早听说过你，月玲常说起你。我问，月玲呢？他告诉我，月玲在工厂早就退休了，一直在一家公司给人家当出纳。亏了她学过财会，家里的进项还能多点儿。他又告诉我，他们老两口一直坚持在大院没走，是在和开发商谈条件，希望能多要一间住房，给儿子住。他们的孙子也到了快结婚的年龄，房子成了老大难问题。

最后，他对我说：你没听说有句顺口溜吗？现在年轻人结婚，得是有车有房、父母双亡。我们没车没房，还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不成了他们的累赘吗？

看他说得分外伤感，我不知该怎么安慰他，跟着他一起叹气。我要告辞的时候，月玲下班回来了，进门一眼认出我，高声叫着我的名字，上前拉着我的手，说什么不让我走，非要留我吃晚饭。我说，等你们分了新房，搬到新家，咱们再吃饭，一起好好庆祝庆祝！

月玲不施粉黛，变得苍老了，只是个头还是那么高，如果从背后看，还显得亭亭玉立，年轻时的影子没有完全被岁月涂抹掉。她送我走出老屋时，我让她陪我去后院看看，她问我：看什么？还有什么可看的？我说看看那两棵老桑树，她一摆手：早就被砍掉了，还老桑树呢！但是，我们还是一起走到后院，蒋家的北房还在，人去屋空，门前凋零；厕所早就没了，盖起了小房，连后面的夹道也都变成了拥挤的房子。小时候我们一起上房爬树采桑葚的情景，恍然如梦。

大前年的夏天，旧地重游，我又回了一趟老院。月玲家还没有搬家，还在等待拆迁。但她家的房门紧锁，我问了另一户没走的老街坊，月玲两口子到哪儿去了？大约什么时候回来？街坊只说月玲的老公搬走和儿子一起住了。我问，月玲呢？街坊反问我：你不知道吗？月玲都走了好几年了！我十分惊讶，忙问：什么病呀？我上次来看她身体还好好的呢！

今年谷雨前两天，家人买了一盒新上市的紫桑葚。我已经好几十年没吃过桑葚了，现在吃起来，忽然觉得很好吃，还有些甜滋滋的味道，和童年吃的味道竟然完全不同。第二天，我用没有吃完的几颗桑葚作画，先在纸上涂抹上一层清水，然后用桑葚做笔，紫紫的颜色，涂抹在纸上，在水的作用下变得深浅不一，渐渐变成了紫色的藤萝架。那一刻，我想起了老院的那两棵老桑树，想起了月玲。

【文化杂谈】
宋仁宗，寂寞的香径独行

□孙葆元

电视剧《清平乐》把我们的目光拉向了北宋，宋仁宗赵祯再一次被戏说。他第一次被戏说是作为“狸猫太子”在乾隆五年的《忠烈侠义传》中，连清代学者俞樾都感觉那个戏说“殊涉不经”，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还是被人们津津乐道地上演了二百年。从狸猫太子到狸猫皇帝，赵祯的民间角色定位在官廷中，香阶罗裙，脂粉落花，让人不胜怜惜。以后讲他的故事，无非宫中的儿女情长。其实宋仁宗是一位有进取心的皇帝。《宋史》说他“天性仁孝，喜愠不形于色”。起码从外表上看，他是一位严肃的君主。

《宋史》载：“真宗第六子，母李宸妃也。”李宸并不是他母亲的姓名，而是封号。《宋史·后妃传》载，她是杭州人，在真宗赵恒朝，被选为“司寝”。对女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职务；对一个后宫的女人来说，这又是一个随时都能得到“宠幸”的职位。果不其然，赵恒把她纳入帐中。进入赵恒帐中的李氏晋升为才人，怀孕后又晋升为婉仪，她的儿子继位后，再晋升为顺容。她付出的代价是永远不能与自己亲生的儿子相见。

幼小的赵祯甫一出生就被刘氏皇后强行抱走，《后妃传》说她“以为己子”。刘皇后是太原人，“性警悟，晓书史，闻朝廷事，能记其本末。”可见她是真宗赵恒得力的私闾助手，真宗退朝以后批阅奏折，往往熬到中夜，这时候刘后多陪伴着他，所有奏折她都预先看过，每逢真宗问她，都能据实相告。这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女人，踞后宫之首，力压三千粉黛。

赵祯投入刘后的怀抱，具体说应该是政治的怀抱。刘后并没有作为母亲的生理能力，而是把孩子交给杨淑妃抚养，她自己只是名义上的母亲。这样，官中三位高贵又美丽的女人就在实际生活中扮演了母亲、名义母亲和保姆的角色。

赵祯跟着刘后受到良好的教育。他前面有五位皇兄，可惜先后夭折，他八岁上被立为太子，成为皇权的继承人。乾兴元年(1022年)二月，真宗赵恒去世。同年，十三岁的赵祯登基，成为仁宗皇帝。刘后也转换身份成为皇太后。史载：“太后保护帝既尽力，而仁宗所以奉太后亦甚备。”这个时候，他的生母李氏晋升为宸妃。宋时后宫可设五位妃子，分别为贵妃、淑妃、德妃、贤妃、宸妃。李氏是真宗朝最后一位妃子。然而政治命运主导着她的生活命运，升为宸妃的她被安排去陪伴丈夫真宗的陵寝，永远地离开了活人居住的皇官。明道元年(1032年)李宸妃病逝，享年四十六岁。

这一段历史被戏说成官廷中骨肉离散、母子两分的故事，可见后宫戏由来已久，并不是当代的创新。狸猫换太子是民间的解读，家道伦理，悲欢离合。然而皇家首先是政治家庭，执政是最高理念，诚如恩格斯所说，婚姻是政治的婚姻，赵祯与三个母亲的故事就不是一个普通家庭的新闻了。先皇故去，刘太后亲自听政，教导少年皇帝，因为她是后官一品，这是执政的需要，断没有让李宸妃听政的道理，朝廷理政不是母子过日子。当年就发生了一件事：赵祯下诏，先

皇殡葬“山陵诸费，毋赋于民”，既是说，所有殡葬用度不得向民众摊派。“蠲山陵役户及灵驾所过民田租”，免除殡仪占地所有民田地租税。这显然不是一个十三岁的皇帝所能做出的决定，决策者是帘幕后失夫的刘太后。

宋代是皇权与相权相互制约的政治格局，“人主之职论一相，一相之职论百官”（《宋代政治文化史论》），颇有点民主政治的味道。刘太后的垂帘在当朝就非议不断，可是“人畏太后，亦无敢言者”。仁宗“犹不知为宸妃所出，终太后之世无毫发间隙焉”，直到太后死去，燕王才告诉他真相，说：“陛下乃李宸妃所生，妃死于非命！”这句话极具挑动性，果然仁宗大恸，悲痛地数日不临朝，情感发生巨大裂变。这个时候范仲淹站出来，告诉他，刘太后也是你的母亲，辛勤地教养你，此恩不可忘记。范仲淹在用国家的道理开导宋仁宗。

杨淑妃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，她悉心抚养幼小的仁宗，刘后很感激她，想授予她做禁军的侄子一个职务，开出的条件十分诱人，让她在所有的司中选一个副职。没想到杨淑妃拒绝了，说：“小儿岂胜大恩，小官可也。”只给她的侄子更名为右侍禁。

三位伟大的母亲用各自的方式成就了宋仁宗四十七年的执政生涯，引导他走上人生香径的同时也给他的心灵造成一份孤独，终生挥之不去。正是这份孤独，让他感受到人世间的跌宕，也看到社稷的跌宕。在治国的时候，他常常不“从私请”而“从公议”，这是当时的法治思想。《清波杂志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，嘉祐年间的一天，他与众嫔妃闲聊，后官皆有等级，那些嫔妃都想擢升，于是撺掇皇帝开恩。“屡有干请，上答以无典故，朝廷不肯行。”仁宗说，朝廷没有这个规矩，即使我开恩，有司也不会批准的。妃子们不信：您是圣上，您说一句话，谁敢驳回？宋仁宗被纠缠得没办法，就坐下来“赐封”，一一写下封号。这些嫔妃们不是刘皇后，哪知朝廷的规矩？就高高兴心地拿着皇帝批的条子去领俸禄。到了有司，人家不认。妃子们急了，就讲道理：这是皇上批的，白纸黑字，你们竟敢不认？有司说：皇上写的也不行，要从公议！“有司不敢用，悉退回。”妃子们讨了好大的没趣。宋仁宗是按程序办事的，写个条子也不过是和妻妾们闹着玩罢了。所以，他的条子被驳回后，他感激地说，“其助我多矣！”

庆历三年(1043年)，宋仁宗拜范仲淹主导发动了一场政治改革，史称“庆历新政”。改革确立了十项方案，为：一，明黜陟；二、抑侥幸；三、精贡举；四、择官长；五、均公田；六、厚农桑；七、修武备；八、减徭役；九、覃恩信；十、重命令。其中明黜陟、抑侥幸、精贡举、择官长都是吏治改革的条款。庆历四年，范仲淹作《岳阳楼记》，有名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，提出了为官的政治标准，不能不说与这次改革的精神是一致的。然而这次改革遭到大地主阶级和众多“抑侥幸”官员的抵制，不久就失败了。宋仁宗始终是孤独前行。